

商人 与近代商业教育



常国良◎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商人 与近代商业教育



常国良◎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商人与近代商业教育 / 常国良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686-0182-5

I. ①商… II. ①常… III. ①商业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7697 号

商人与近代商业教育
SHANGREN YU JINDAI SHANGYE JIAOYU
常国良 著

责任编辑 刘 岩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三道街 36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77 千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86-0182-5
定 价 5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中国近代商业教育研究”（项目批准号：12D032）的研究成果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传统商人的历史与近代商业教育的萌芽	17
第一节 中国传统商人的历史	19
第二节 近代商人的崛起	50
第三节 近代商业教育的萌芽	76
第二章 近代初等与中等商业学校教育	83
第一节 商业学校教育是时代变革的产物	85
第二节 清末商业学校教育制度的形成	90
第三节 民国时期商业学校教育的发展	105
第三章 商会与近代商业教育	131
第一节 近代商会的基本概况	133
第二节 近代商会对商学的提倡	158
第三节 商会创办的商业学校	167
第四节 商会举办的社会教育	193
第四章 区域文化背景下商业教育的近代变迁——以晋商为例	205
第一节 晋商商业人才教育的传统	208
第二节 明清晋商的教育观	213
第三节 近代晋商所接受的新式普通教育与商业教育	227
第四节 近代商业教育中晋商的转型	244
第五章 近代商业教育思想	251
第一节 晚清的商战思潮	253

第二节 郑观应的商战与商业教育思想	267
参考文献	279
后 记	291

绪 论



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结晶。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许多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并吸收了近年来文学史研究的新成果。本书力求做到观点正确、材料翔实、行文流畅、重点突出。全书共分五编，第一编为绪论，第二编为先秦两汉文学，第三编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第四编为隋唐五代文学，第五编为宋元明清文学。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仁的帮助，特别是某某教授在内容审定方面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特此致谢。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某某某

2023年X月X日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商业教育是近代兴起的一种职业教育形式。它将商与学结合起来,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商业知识,并掌握新型商业企业经营管理方法的专门人才,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商业的现代化和社会观念的转变等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就管见所及,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商业教育的研究相对薄弱。近代教育史将其列入实业教育、职业教育,论述颇显简略;近代商业史则多介绍商业企业内部培养人才的做法,对于商业学校教育则不甚关注;近代商会史所涉及的则仅是商会所办的商业补习教育;商业院校学者也多局限于本校历史的研究。这种状况与商业教育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很不相称。因此,研究整个中国近代商业教育及其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从理论上,商业教育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和解释商业与教育的近代变革具有双重意义。在教育方面,中国近代商业教育是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商业近代化和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内容。首先,近代出现的新型商业企业组织,以其复杂的支撑理论和精密有序的经营法则,使传统的学徒式商业教育制度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学徒制“私立而分散的性质却意味着这种教育方式不易推演为提供标准化新知识和新技术或培养政治上的可取态度的新式教育”^①。其次,西方

^①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4页。

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中西激烈的商业竞争使新兴的中国民族工商界面临极为不利的处境。最后,随着中国社会由闭锁走向开放,西方工业革命后兴起的包括商业教育在内的新式职业教育在各国教育制度中的确立和发展,为中国近代商业教育提供了可资效法的榜样。中国近代商业教育的研究,为从一个侧面认识以向西方学习为主旋律的中国教育近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商业方面,近代商业教育是近代商业变迁的一部分,研究商业教育无疑有助于认识商业近代变革这一历史主题。目前史学界对商业史的研究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研究团队,并且产生出一大批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但令人注意的是,近代商业教育在商业史中仍然是一个薄弱区。商业史大多研究了商会“兴商学、开商智”的问题。这虽然是近代商业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商业史主要是从商会振兴商务的经济职能角度进行论述,并且零星而不系统,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从实践上看,研究中国近代商业教育,总结其发展的经验教训,可为当前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历史资源,也可为理解和解决新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商人的问题提供诸多历史借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商人在近世社会发展中曾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中国商人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商业的现代化和社会观念的转变等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研究现状综述

目前,关于商业教育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商人与教育近代化关系的研究。二是诸如商帮、公所、行会、同业公会、商会等商人群体或组织与近代商业教育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三是按地域,以不同地区为背景进行的相关商业教育发展的研究。四是传统地域商帮与商业教育的研究,其中徽商作为一个典型备受关注。从整体上看,目前学界对商业教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从全面的视域着手,将近代商业教育放在中心地位进行的研究更少。

(一)商人与教育近代化关系的研究

在教育近代化中,商人通过投资兴学等方式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致力于兴学的商人类型来看,现有研究可分为以下四种情况:一是我国近代的特殊商人群体——买办对近代教育的资助。二是有商业背景的宗族组织举办义学、讲学、助学,以及民国时期分别有从政、从商、从教三种身份的新乡绅,他们接受了新式教育并控制族学,对族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三是士人型绅商对兴办新式教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事教育行业的学绅也多有在各种各样的公司中挂一个董事或股东的名分者。四是普通的活跃在各个行业的商人对家乡或其他地域教育发展的支持,如叶澄衷、周廷弼等,这种情况更是数不胜数。这方面的研究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关于商人投资兴学的原因。商人投资兴学体现了商人对兴学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乐承耀在对宁波帮商人的研究中指出,“宁波帮为推进家乡教育而做的种种工作,是广大宁波籍商人对教育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进行的”^①。商人投资兴学的原因可归纳为:一是近代商业的发展,对人才需求急剧增加,开通商智、培养商才成为迫切需求。受近代化的推进、教育近代化启动的影响,“商战”与“学战”应运而生,促进了商人的崛起与对“人才”的关注。近代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急剧增长,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二是商人出于道义、实现自身价值的文化追求。很多商人把办学视为一种公益慈善事业。商人“惠及桑梓”的人生态度、对道德及“义”的追求以及超越商人“获利”的人生价值追求都极大地促进了商人投资兴学。^②同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念也促使商人支持家乡教育事业。三是商人出于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而兴学。他们为了“开民智”,实现教育救国理想而办学。商人捐资教育的重要推动力源于他们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

① 乐承耀等:《宁波帮经营理念研究》,宁波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

② 参见阎广芬:《经商与办学——近代商人教育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5~105页。

责任感。^①四是政府的激励作用。综合现有研究,学者们基本认为政府的激励对商人投资办学来说是重要的保障。五是在近代“商”与“学”的客观互动的结果。

其次,是关于商人捐助教育的意义。关于商人捐助教育的意义,笔者查阅的相关研究资料包括:阎广芬的《经商与办学——近代商人教育研究》、朱英的《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乐承耀等的《宁波帮经营理念研究》、王春霞和刘惠新的《近代浙商与慈善公益事业研究(1840—1938)》、王东京的《近代商人兴学与当代民办教育》、赵丽华的《经元善与中国女学堂的兴办》、杨艳萍的《论清末“商务报”与近代“商学”兴起》、章仲根和赖其云的《宁波帮与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李忠和王筱宁的《前近代商人对教育的介入及其影响》、张世慧的《转型时期下层商业人才的培养》。这些研究资料的着眼视角各不相同,但它们都肯定了商人办学在近代教育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最后,是关于商人投资兴学的方式。关于投资兴学方式,阎广芬根据投资的主体,认为近代商人对兴学进行的投资主要包括“个人投资”“以血缘为纽带的投资”“以地缘为纽带的投资”“以业缘为纽带的投资”。根据商人捐学的类型,她认为近代商人投资兴学的方式包括捐助近代学校教育、促进近代社会教育发展、致力于近代实业教育的开展、介入近代教育社团的创办且广泛参与其活动。^②

(二) 商人社团与近代商业教育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

商人社团兴学是近代商人兴学的重要特征。近代商人开始借助团体的力量致力兴学,这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进步性。不论是传统的行会、商帮、公所,还是近代的商会,这些商业组织,尤其是商会,在近代的教育活动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会是近代重要的新式商人社团,在设立宗旨、组织结构、活动功能上

^① 阎广芬:《经商与办学——近代商人教育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② 阎广芬:《经商与办学——近代商人教育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都不同于商人会馆和商业公所等旧式商人团体。它的成立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并发挥作用的一个界标”。商会为发展民族商业,开始有组织地致力于近代商业教育,但它在此时已经不同于前近代的旧式商人办学。在中西“商战”背景之下,商会的办学不仅是为了“造福桑梓”或“亢宗大族”,更是为了“战胜于国际交易”“与外人商战”。

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李忠的《商会与中国近代教育研究》、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马敏和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苏州商会研究》、乐承耀等的《宁波帮经营理念研究》、庞玉洁的《开埠通商与近代天津商人》、朱英和郑成林的《商会与近代中国》、胡光明的《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王春霞和刘惠新的《近代浙商与慈善公益事业研究(1840—1938)》、陆远权的《重庆开埠与四川社会变迁(1891—1911年)》、李平的《清末民初商会设立的商业学堂》等。他们论述了商业组织在近代的兴学状况,商会在鼓吹近代商业教育、影响商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商业补习教育的举办等方面起到了突出作用,然而这些都不是以“近代商业教育”为主题进行的研究,商学仍未成为研究的中心。

(三) 区域性商业教育发展的研究

区域性商业教育的研究是以研究某个地区的商业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这类研究除能体现全国商业教育发展特点外,更能体现区域文化的发展特色。目前,区域性商业教育的研究集中在上海、天津及广州等地,但也涉及湖北、浙江、重庆、山西等地的区域性商业教育的研究也零星存在。

赵永利在其博士论文中对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进行了研究。如他所述,“对上海各大学商科教育活动的深入考察是本文的重点”^①。他论述了西方新兴的商业学校教育被纳入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过程和商科教育萌生期的基本概况,分析了民国不同时期中国高等商科教育制度的变迁及上海近代商科教育

^① 赵永利:《教育变革与社会转型——近代上海高等商科教育活动研究(1917—1937)》,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页。

快速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概况,并阐明了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与上海高等商科教育兴起之间的关系。

曾金莲对广东地区的大学商科教育进行了研究。她“论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地区大学商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情况,深入探讨大学商科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①。

李雪梅在其硕士论文中对湖北 1890—1920 年特定时段的实业教育进行了研究。在分析湖北传统教育兴盛及衰败的基础上,她探析了湖北实业教育兴起的原因。她认为,“实业教育即是关于农业、工业、商业的教育,它是近代兴起的新式教育形式之一”^②。她从近代商业相关的教育角度对湖北地区进行研究,这对近代商业教育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郑成伟在其硕士论文《近代天津商业教育研究》中对天津的商业教育进行了研究。他分析了天津近代商业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以及初、中、高等商业学校的发展与困境,并从校务管理以及教学管理方面对近代天津商业学校的办学进行了详述。

马修进在其硕士论文《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商业教育研究(1912—1937)》中阐述了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商业教育。首先,他从近代的“商战”与“商学”关系角度分析了近代初期重要的商业教育教学制度——学徒制,并论述了近代的商战思潮与教育救国理念以及商业教育在新的环境下的发展。其次,他从近代重要的商业组织——商会着手,分析了近代商会的兴学政策、活动以及商业补习学校的发展,并给予积极的评价。他还对国外各宗教差会及其他团体在华北办的商业学校进行了分析。最后,他从宏观上分析了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商业教育的特点与不足,并与其他地区的商业教育进行了一定的比较。

① 曾金莲:《广东地区大学商科教育研究(1924—1937)》,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中文摘要。

② 李雪梅:《1890—1920 湖北的实业教育》,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内容摘要第1页。

(四) 传统地域商帮与商业教育的研究

明中期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商路的扩展,商业经济开始成为某些地区经济的主导,商业文化也相应成为这些区域的特色文化,随之涌现出一批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关于徽商与徽州商业教育的研究比较多。“无徽不成商”,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州的地域文化鲜明,如徽州教育、徽州刻书、徽州经学、新安理学、徽派建筑、徽州园林、新安画派、徽派篆刻、新安医学、徽派版画、徽州三雕、徽州的自然科学和数学与谱牒学及方志学、徽剧、徽菜、徽俗、徽州水口等等均富有特色。^①关于徽州商业教育,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有李媛媛的《从〈士商类要〉看明代徽州商业教育》、戴元枝的《从明清徽州杂字看徽州的商业启蒙教育》、宗韵的《明清徽商家庭商业教育述略》、李琳琦的《明清徽州商业社会中的教育特色》、孟颖佼的《清末徽商捐资兴学与抗缴学捐述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对徽州商业教育进行了阐述。

综上所述,关于近代商业教育,在教育史和商业史方面已经呈现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商业教育的不同方面,提出了许多颇具启发和借鉴意义的重要观点,更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但尚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

三、相关概念

(一) 商战

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指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重商主义思潮的出现,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欲通过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经济竞争,以使中国走上摆脱外来压迫、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商战不是中西方之间单纯的商业和贸易竞争,竞争范围涉及生产和流通的各个部门。商战思想初步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实业救国的美好愿望,是近代“实业救国”思潮的早期形态。商战思想一直是近代商业教育产生和

^① 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4页。

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

（二）商学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商学的意义：一是泛指有关商业的知识、学问，即商智，这可以通过译书、阅报、游历、经商实践、学校教育等途径学到；二是特指商业学校教育。显然，这两层意义是相互联系的。

（三）商业教育

商业教育的对象是商人，商业教育是培养商人的教育。从一般意义上看，商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一定商业道德、商业知识和商业技能的商人。商业教育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文化性。本书研究的是中国近代商业教育，这是一个具有特定时空内涵的概念。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基本上是中国整个近代，也就是从1840年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中国社会被西方列强强行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在个别章节，由于所论问题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统一体”之中，时间范围会适当拓展。如第一章在考察近代商人群体的崛起时，对中国传统商人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梳理。在地域范围上，它是研究全国性的商人与商业教育，但在技术处理上，这里显然没有必要对全国所有的商人和商业教育进行面面俱到的研究。为了达到说明问题的目的，它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个案为考察重点。这样处理从研究方法上看显然是可行的，因为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所谓“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就是研究总体的一个有效样本。

从外延上看，近代商业教育主要包括商业学校教育和商业社会教育。在近代商业教育发展中，不仅存在各种全日制的商业学校教育，而且还有商业补习学校、商业图书馆、商业博览会、国货展览会、商业书籍杂志等各种形式的商业社会教育。根据近代商业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笔者对近代不同时期的商业教育做了不同的侧重。在19世纪后期即近代商业教育的萌芽时期，正规的商业学校教育还没有产生，但商务英语教育和以买办为代表的近代新式商人在商业革命实践中所接受的社会教育具有明显的近代特征。因此，在19世纪后期，笔

者主要将研究集中在商业社会教育上。进入20世纪后,随着商业学校教育的诞生并逐渐成为近代商业教育的主体和发展方向,笔者研究的重点因之转向商业学校教育,并同时兼顾商业社会教育。

四、研究内容

本书采用主题的形式,对中国近代商业教育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它包括19世纪后期近代商人的崛起与近代商业教育的萌芽、20世纪上半期近代商业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商会与近代商业教育的发展、区域文化背景下商业教育的近代变迁以及近代商业教育思想这五个主题。

(一) 中国传统商人的历史与近代商业教育的萌芽

商人是商业教育的对象与主体,研究商业教育显然不能“不见商人”。我国商人的历史十分悠久。据文献记载,早在我国上古社会就出现了商人和商业活动。夏商周三代时期,商品经济没有得到发展,在“工商食官”的框架中,商人和商业活动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与管理,商业经济发展较为迟缓。

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中,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商人空前活跃,与士、农、工一起构成了传统社会的重要基础。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伴随,传统商人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与明清三个高潮。秦汉时期,“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已富贵矣”。虽然政府对商人采取了限制和歧视性的政策,但是商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俨然构成社会的一个“素封”阶层,着实令人生羡。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新发展为商人提供了施展能量的大舞台。这不仅造就了新一代的商贾,而且工商业者开始建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商路的扩展,商业经济空前活跃,传统商人发展达到顶峰,形成了众多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商业文化,商帮、会馆、公所等组织成为团结商人的重要纽带。

在近代商业变革与“商战”的社会环境中,传统商人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嬗变。中国商业近代化的启动要早于教育近代化。据美国学者郝延平的研究,在